



KEJI GEMING YU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

吕乃基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N082
15
吕乃基 著



KEJI GEMING YU ZHONGGUO SHEHUI ZHUANXING

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技革命与中国社会转型/吕乃基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6

ISBN 7-5004-4098-7

I. 科… II. 吕… III. 技术革命-影响-社会发展-研究-中国 IV. 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3734 号

图书策划 任 明
特邀编辑 傅 康
责任校对 李 莉 林福国
封面设计 王 华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 版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0.75	插 页	2
字 数	276 千字		
定 价	2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乃基教授时有大作问世，思路开阔，行文潇洒。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史，后来转而研究科学技术的文化背景问题，涉及社会转型，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并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眼下这本新作就是以科技革命为基本线索，以内生型国家的发展道路为参照系，通过对现代性的进一步分析，试图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的转型问题。

每当我们思考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根本差异的时候，必然会揭示出的一种现象是，传统社会保持着循环式的绵延，而现代社会则有一种持续的自我维持的增长。对这一现象的诠释可以有多种，但其中最根本的因素恐怕还是与整个社会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密切相关。当我们惊叹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时，不要忘了那些巧夺天工的器皿和饰品不过是少数贵族的玩物，是等级的符号标志。在传统社会中，有价值的东西很难存留于民间，一些有象征意义器物的生产和使用甚至必须由君主授权。在资源有限的社会里，这些现象是不难理解的，但正是在这种思路下，传统社会几乎是一种没有增长的社会。

我们今天开始生活在一个丰裕的社会之中，整个社会用各种方法刺激着每个人的消费欲望，更刺激着每个人为这种不断升级的消费欲望而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从原则上来讲，现代社会的一个广为人们认可的巨大进步是机会均等，即大多数人通过努力有可能成为巨大财富的拥有者；同时，即便个人在社会竞争中处于相对不利地位，社会的总体发展仍然会使他们受益。这是现代社会较之传统社会更为进步的主要方面，是一种值得称道

的、使人类走向解放的发展环节。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呢？无需对历史进行繁琐的考证，即可指出其关键是人们认识到了“把蛋糕做大”这么一个极其简单明了的道理。其巧妙之处也是显见的，一方面，财富的增加会刺激所有的社会成员投身于旨在拥有更多财富的竞争之中；另一方面，财富总量的增加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成为不同程度的受益者。这恐怕是人类目前所找到的兼顾效益与公平的最佳思路。然而，现实的情况较我们的事后分析要复杂得多，历史发展的脉络总是在现实可能性中逐渐展开的，历史的合理性往往潜藏在众多试探性的选择之中，是众多无意识行动中体现出的有意识。在“把蛋糕做大”的思路的鼓舞下，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其最为重要的体现就是资本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发展。

在有关资本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中，人们关注的焦点有四个方面。

其一是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即出卖劳动力的生产者仅获得劳动力的价值，劳动产品的分配由资本家支配，由此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其二是强调资本主义精神，即新兴的资本家将创造财富和积累资本当做一种神圣的事业，由这种准宗教性的冲动内在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蓬勃兴起。

其三是凸显自然经济向金融经济的嬗变，这一变换的实质是市场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其所导致的交易的符号化使价值的实现与时间相关联，成为一种指向未来预期价值的开放的连续体。

其四是对垄断和创新的追求，即依据收益递减规律，惟有不断地在技术和制度上进行创新，才可能在某一部门和地区形成垄断，获得超额利润，而这是资本积累的主要途径。

这四个方面从不同层面反映了资本主义的内涵，只有通过

它们的全面检视，才能获得对资本主义的总体理解。

人们一般会首先关注第一个方面。无疑，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研究抓住了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表明，当资本主义体制下的产品分配不公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严重地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引发难以克服的社会矛盾乃至社会危机，处于不利地位的无产阶级可能通过暴力革命，以强调分配公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这一理论预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并为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所验证。

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和殖民地与半殖民地，而不是发生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往往不是由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而与资本主义和生产力发展相对落后相伴随。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由于革命是一场有代价的社会变革，是否选择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取决于人们对于社会主义蓝图的美好预期，还与大多数人对现实生活的满意程度有关。仅从物质生活层面看，人们对现实生活的满意程度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首先是个人所占有的财富的多寡，其次是分配是否公正。显然，当个人占有和支配的财富能够基本满足生活需求，且有不断累积的趋势时，即便产品的分配存在很大程度的不公，人们依然倾向于社会改良而不是社会革命。从历史事实来看，不论是前苏联还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表面动因的确是社会分配不公，但这种分配不公之所以引发了社会革命，还在于生产力的落后和财富的普遍匮乏这一深层原因使社会不公愈显显得难以忍受。贫穷加剧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敏感，极度贫穷背景下的分配不公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感到彻底绝望，为了寻求一种更为公正的社会体制而义无反顾地投身于社会革命之中。

因此，通过社会主义运动而揭示出的现代社会的矛盾不仅在

于我们以前所认识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不可调和，更为基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发展不足、社会财富稀缺。换言之，任何人道主义的社会构想必然建基于这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所谓社会公正问题与财富的总量和增量是不可分的，社会分配方案必须以财富的总量和增量为基础，否则只能是空想。因此，仔细考察近百年的社会主义运动，不难发现，尽管社会主义将社会公正置于至关重要的理想层面，最终无法回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问题，而鉴于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的薄弱基础，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特别引人注目。

乃基教授在大作中试图从科技革命出发来探讨社会转型，以便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极为复杂多样，充满曲折甚至倒退，很难把握其规律和普遍性，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在社会学和经济学领域，这无疑是很重要的视角。这两个学科在研究中注重实证依据和逻辑分析，对复杂社会的细节和结构框架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然而由于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有必要扩展我们的研究，而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可以为研究社会及其转型提供新的视角。因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而言，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有三个特点：首先，科学技术是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规律也就等于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简单、清晰，所以由此入手研究社会和社会结构转型不失为一条捷径。第三，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相对较少受认识主体的影响，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因而容易得到各方的认同。乃基教授的出发点是很恰当的。

目前关于转型的研究各有侧重，分别涉及下述三个层次：一是社会转型，即由传统到现代、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从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

其根本标志是经济基础转型，从农业、畜牧业到工业，再到“后工业”。其次是社会结构转型，主要是调整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的关系，其标志是在经济基础基本上维持不变的条件下整个社会又确实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最后是社会中局部关系如消费结构、城乡关系等的调整，它只发生在局部领域，所涉及的时间一般更短些。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而且同时包括上述三个层次。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也有认为从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就被强行推入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至今已有一百六十余年。在这一个半世纪多艰难曲折的征程中，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社会结构转型，其间还有多次失败或挫折。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 1840 年以来中国社会转型道路上的第三次社会结构转型，二十几年来也已发生了一系列局部的转型。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这次社会结构转型将最终为中国社会转型铺平道路。

乃基教授为了把研究做深入，详细论述了作为主线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推动内生型国家由传统到现代以及由现代到后现代的变化，并试图从哲学上说明内生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普遍性。他认为知识经济是由现代到后现代的深化，全球化则是内生型国家由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中将现代性推向全球，以及发展中国家加入现代化行列的过程。他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阐明了现代性的哲学基础，论证有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人类彼此交往的共同的平台。

我认为这是一本很有意义的书，拉杂写了上面一些话，是为序。

刘大椿 2004 年元月于人民大学

前 言

—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极为复杂多样，充满曲折甚至倒退，很难把握其规律和普遍性，社会转型就更是如此。目前学术界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在社会学 and 经济学领域，这无疑是重要的视角。这两个学科在研究中注重实证依据，根据特定的理论框架，对复杂社会的细节和结构进行条分缕析的研究。然而由于社会的极端复杂性，有必要从各个不同角度加以研究，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可以为研究社会及其转型提供新的视角。这是因为相对于人类社会的其他活动而言，科学技术及其发展规律有三个特点：首先，科学技术是历史上，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各项活动中最基本的活动，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科学技术的规律也就等于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其次，科学技术的发展相对简单、清晰，所以由此入手研究社会和社会结构转型不失为一条捷径。第三，科学技术及其发展相对较少受认识主体的影响，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因而容易得到各方的认同。

揭示科学技术的内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这是研究的出发点。从科技革命出发来探讨社会转型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目前有众多关于转型的研究，大致可以把这些研究分为三类，其一，大多数学者研究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这是转型研究的主流；其二，一部分学者研究如英国的光荣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等这样的转型；其三，还有个别研究者把如市场需求由日常消费

品到耐用品也称之为转型，等等。这三类研究的对象就构成了转型的三种类型。

转型的三种类型基本上构成三个层次：首先是由传统到现代，以及由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型。因为这种转型包括从经济基础到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整个社会的深刻变化，所以是一种“社会转型”。其次是社会结构转型，主要是调整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的关系。最后是社会中局部关系如消费结构、城乡关系等的调整。社会转型的根本标志是经济基础转型，从农业、畜牧业到工业，以及从工业到“后工业”。在世界史上，社会转型大约经历 200 年。社会结构转型的标志是，一方面经济基础基本上维持不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确实发生全方位的变化。社会结构转型大约需要几年至几十年。第三种转型只发生在局部领域，所涉及的时间一般更短些。

社会转型包含后两种转型。社会转型都需要发生社会结构转型，后者为前者铺平道路和提供动力。有的社会转型只需发生一次社会结构转型，例如英国和法国，而有的社会转型需要多次社会结构转型，如德国从 1848 年革命一直到一战和二战；俄国从彼得大帝的改革、1905 年革命、1917 年十月革命，一直到 1991 年前苏联解体；日本则有明治维新和战败后的被占领，等等。在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当然会发生一系列各种各样的局部转型，或者说，社会结构转型就是由几乎无数个局部而又彼此相关的转型所组成。社会结构转型既服务于社会转型，为社会转型创造条件，其本身又可分解为大大小小和形形色色的局部转型。

毋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处于转型之中，而且同时包括上述三种类型。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也有认为从洋务运动或戊戌变法或辛亥革命开始），中国就被强行推入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之中，至今已有 160 余年。在这一个半世纪多艰难曲折的征程中，中国已经经历了辛亥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成功的社会结构

转型，其间还有多次失败，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仍未从根本上为社会转型铺平道路。70 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是 1840 年来中国社会转型道路上的第三次社会结构转型，二十几年来也已发生了一系列局部的转型。从二十几年的历程来看，这次社会结构转型将最终为中国社会转型铺平道路。

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这是研究的最终目标。

二

揭示科学技术的内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这是研究的出发点，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这是研究的终点，在出发点和终点之间还有巨大的鸿沟，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本书的基本思路是，第一篇由众多社会活动中的特殊领域——科学技术革命着手，揭示其规律，经由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关系而扩展到第二篇内生型国家（这里需要说明，在本书中除非特别指明，内生型国家和外生型国家都是指一类国家，甚至泛指某一地区，如地中海北岸或西欧）的发展规律。但这一规律特别是现代性是否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仍不确定，因而第三篇再上升到哲学层面。最后第四篇再回到众多社会之中的某个特殊的社会里。这是一个由特殊经一般再到特殊的推理过程。

这一过程本身存在风险。推理过程的前半段由特殊到一般主要是归纳推理，然而归纳推理具有不可靠性。对此，作者的思路是，首先，科学技术是社会系统中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已有共识。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是社会发展的主线大致也可认同。其次，通过系统论方法由作为要素的科学技术推知作为系统的社会。复次，详细论述作为主线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如何推动内生型国家由传统到现代以及由现代到后现代。由此基本上弥补归纳推

理存在的问题，但还有待进一步升华，以从哲学上说明内生型国家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普遍性。这是前半段道路的终点，也是后半段道路的起点。

推理的后半段是由一般到特殊，因而主要是演绎推理。只要推理过程正确，演绎就不会有问题。但是这一判断的条件是，演绎的大前提也就是后半段道路的起点必须正确。另外的问题是，通常认为，演绎推不出新东西，结论中的内容已经包含于大前提之中。所以关键在于，在由大前提推向小前提时结合小前提特殊的语境，找出在特殊的对象中大前提的那些共性必须保留，那些是属于特殊对象自己的个性。重要的是，仅仅由大前提并推不出全部个性。同时，共性不排斥个性，个性不违背共性，二者共处一个统一的个体之中。

三

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认识科学和科学的发展规律。科学是知识、方法和活动。相应于这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也就是本体论的视角来看，科学知识的发展经历远古时期的混沌，经由古希腊—近代—现代的规律、有序阶段，到今天的新的混沌。其中第二阶段又可分为三个环节，即古代与对象也就是自然的演化保持原始的一致，经近代与自然的演化相反，再到现代与自然的演化相一致。从研究方法和认识论的视角来看，科学认识的发展经历由原始的综合经分析再到辩证的综合，由主客体不分经分离再到相互作用，以及由直觉经逻辑再到直觉。从科学本身的含义和从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入手，科学经历原始时期与社会之间的浑然一体，经独立发展并提出默顿规范，再到成为社会系统中的要素和提出宽容、理解以及自律和他律。对于科学发展规律的这些分析将成为后文从哲学上讨论现代性的基础。

技术主要由物质系统、制度和观念组成。鉴于技术与社会的关系远比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密切，因而不仅可以从技术的角度，而且可以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技术的发展规律。但作为全书逻辑的起点，在开始时选取相对纯粹的技术的视角——物质系统，然后再逐步进入制度和观念领域。就物质系统而言，从运动形式来看，技术的发展经历由古代的高级运动经近代的基本物理运动再到现代的高级运动，这一点与科学的发展规律十分一致；从相互关系来看，技术的发展经历由“杂多”经“内部无差别的一”再到“内部有差别的一”；还可以把技术的发展与生物的进化相类比而发现技术的“进化树”；进化树上工作机、动力机和控制—学习机的关系，以及进化就是人化的过程。“人在自己的创造物中直观自身”（马克思）。对于技术发展规律的分析将成为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

理解社会的视角显然更为复杂多样，与全书的基调相一致，这里以系统论、控制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来考察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过程。社会是一个由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彼此间发生功能耦合作用的系统。然而功能耦合存在局限，功能会发生异化，社会结构与社会生活也就是形式与内容间存在矛盾，再加上环境的影响，因而社会结构必然发生演变。以耗散结构理论中的分叉图观之，社会结构转型即系统发生巨涨落并处于分叉点，然后可能进入多个分叉中的某一个分叉。这部分分析既为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作好准备，也成为最后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出发点。

科学技术必然与社会结构中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子系统发生相互作用。科学主要经由其知识体系、方法和科学精神影响社会，社会则在更大的范围以本体论、认识论以及价值观和具体的科技政策选择科学。技术主要经由其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观念层面影响社会。显然，技术对社会的影响较之科学远为直接、广

泛和深刻。反之，技术同样受到来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而又深刻的影响。

科学技术是社会中最基本的要素，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革命必然促使社会结构转型进而推动社会转型。近代科学革命和两次工业革命推动英国等国家由传统走向现代。这一过程之所以先发生于英国等国家，从根本上说，只不过是这些国家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顺应了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才有所谓“内生型”之说。20世纪现代科学革命、高技术和后现代科学正在推动发达国家由现代走向后现代。至于当代社会的最新发展和学术界讨论的热点——知识经济和全球化，前者是内生型国家现代化深入发展日益走向后现代的必然趋势，后者则是内生型国家道路扩展和外生型国家加入现代化道路的结果。由上可见，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其中的转折即科技革命与内生型国家现代化和后现代化^①路径的一致性，从而表明由科技革命来探讨社会转型的可行性与合理性。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道路将成为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参照系，当然，这还有待论述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和普遍性。

可以从本体论、认识论 and 知识论等三个方面来论证这条道路的必然性和普遍性。首先考察认识论。在前述分析科学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由古代主客体不分经近代的分离再到现代和后现代的相互作用；由马克思所论述的认识过程的第一条道路，经“最贴近的规定”，再由“第二条道路”

^① 关于“后现代化”或“后现代”一词目前还有许多争论，诸如“第二次现代化”、“激进式现代化”，以及“自反式现代化”等，但这些说法所对应的事实或现象基本上是一样的。作者无意介入争论，用“后现代化”一词，其一是因为在众多反对声中，“后现代化”一词反而影响更大，其含义也更容易理解；其二是在本书的行文中，用“后现代化”较有助于阐明观点。自然，由于这样的一层关系，本书的论述也就在无意中赞同“后现代化”的提法。

在思维中重建对象；以及由感性经知性（理性）再到悟性。

在本体论上，要从对象的现状回溯到其发展演化的起点，然后再由此出发。在否定了传统社会之后，启蒙运动追溯社会的“自然状态”并得出人的各项天赋权利，亚当·斯密研究摆脱了习俗和权力后的市场经济并提出经济人假设，洛克揭示社会以个人为本位和卢梭提出社会契约论，以及从近代科学技术中提炼出来的科学理性和工具理性，等等，所有这些——也就是现代性——即作为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而成为之后社会发展的起点。由逻辑的东西与历史的东西的一致性可知，历史上在先的东西就是逻辑上作为基础的东西。因而现代性又作为基本的要素成为社会系统的基础。现代性既是人类和社会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古代的知识可分为隐性知识、想象和嵌入的编码知识，其根须深扎于各民族、部落独特的自然背景之中，追溯到遥远的历史体验之中，彼此间难以沟通。知识的源泉越是久远，其根须就越是细微，直至个人所经历的个别事件。知识萌芽于混沌之中。近代之后非嵌入的编码知识兴起，现代性正是这样的编码知识。现代性因其不嵌入而能够穿透各种传统的知识体系，取代其独特的隐性知识、想象和嵌入的编码知识，成为知识的主干。现代化就是非嵌入知识的形成和扩散的过程。现代以来，在非嵌入编码知识的基础上，新的嵌入的编码知识、隐性知识和虚拟知识组成新的知识体系，这些新的知识体系既各具个性，又彼此相关，如同知识之树上茂盛的枝叶，相互纠缠着伸展向新的混沌。

经过对以科技革命为主线和基础的内生型国家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道路的进一步抽象提炼，揭示这是一条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道路。在这条道路上，现代性具有必然性和普遍性，是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和交往的共同平台。从而也就确立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

和后现代化道路作为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参照系。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之中。可以由两个方面来研究社会结构转型：其一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特点——渐进——着手。渐进式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是外强内弱，条件是政权强民众弱，整体强个体弱，以及政治强经济弱。这种社会结构转型对于社会转型的优势是赶超、有序和自主，然而也存在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强大的政权、整体和政治是为了培育弱小的民众、个体和经济，使之摆脱对政权、整体和政治的依赖，并使自身最终建立于自强的民众和个体，以及强大健全的经济的基础之上。必须改造计划经济遗传下来的权力，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在这一演变过程中，中国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动力逐步由自上而下转为自下而上。

其二从内生型国家现代化道路的起点——文艺复兴运动切入。文艺复兴运动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人与自然的发现，每一个个人由此在精神上走向独立，这一点对于西欧社会的现代化必不可少。然后第二阶段才转向务实并发生近代科学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法国的启蒙运动、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等都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阶段。虽然由于时代和国情不同，内容和形式也会发生变化，但总的来说，它们都是对封建制度和宗教蒙昧的批判^①，促使人的解放。

站在这一角度审视中国的五四运动，可以发现五四运动正是发生在20世纪初中国大地上的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一阶段，是中国的启蒙运动和狂飙突进运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场运动不久即告夭折，再加上内外战乱，中国的命运多舛。1949年后，中国在没有彻底批判封建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情况下就开始了第二

^① 显然，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尤其是后者）并不彻底，因而影响了这两个国家后来的发展。

阶段，着手工业化，最终陷入困境。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以来至今的改革开放同样可以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重在思想解放，是被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五四运动在80年代的延续，1992年后转入第二阶段。必须承认，面对人的解放的重任，背负数千年封建社会的重担，以及面对近代史上如此多的曲折、倒退和磨难，第一阶段是不充分和不彻底的，由此必然会对第二阶段带来不良影响，核心是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关系，到头来还得补第一阶段的课。在上述两个方面，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目前正面临分叉点。中央值此关键时刻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必将引领中国顺利地走出分叉点，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应放在世界的背景中考察，放在整个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判断，以内生型国家的现代化和后现代化道路作为讨论的参照系，在这样的考察和判断中明确中国的定位和前进的方向。中国在整个上位于由传统走向现代的途中，而发达国家正在由现代走向后现代。于是在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上，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正沿着相反的方向前进，中国面临两次社会转型的叠加，这就给中国带来困惑。中国要赶超发达国家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赶超的道路上，既要与国际接轨，又要坚持中国特色。与国际接轨就是与现代性接轨，全盘接受共性的东西，这是任何国家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由之路，也是不同国家交往的共同的平台。中国特色就是在现代性的基础上根据国情所确定的自主的发展，是在共性基础上发展的个性。中国之路而且不是一厢情愿的道路，不仅要考虑到自身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目标，要有中国特色，以及要经过必由之路，而且要放在世界上，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在与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竞争、合作、较量和博弈中考量。